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清代中越关系研究 (1644-1885)

孙宏年◎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 西南边疆卷



清代中越关系研究

(1644—1885)

孙宏年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孙宏年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16-7097-1

I. ①清… II. ①孙… III. ①中越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644~1885 IV. ①D829.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321 号

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

Qingdai Zhongyue Guanxi Yanjiu(1644—1885)

孙宏年 著

选题策划 丁一平 华 汉
责任编辑 华 汉 杨云鹏
封面设计 sddoffice.com
版式设计 王 绘 周 磊
责任校对 李欣欣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097-1 定 价 70.0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hljep.com.cn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侵权、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我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9-2925628

举报。举报电话:0451-82533087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

编委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厉 声

副 主 编:丁一平 于逢春 李大龙

编委会成员:丁一平 马大正 于逢春 王子今

王希隆 厉 声 吕一燃 李大龙

李治亭 李金明 李国强 邢玉林

林荣贵 周伟洲 魏存成

序 言

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

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 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

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学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 development。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为了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近50种近代以来

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作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近 50 种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 1949 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近 100 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 and 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编谨识

序

葛剑雄

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藩属国关系的演变、与此相关的疆域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组成部分。但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往往视之为畏途，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尚无改观。固然，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做过不少，因而不易取得新的成绩，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障碍——一涉及现实需要，历史事实也会变得非常敏感。有时学者辛辛苦苦完成的论著，得出的结论，却因不合时宜而被束之高阁，或者只能作为内部流通，无法为学术界与社会所利用。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大多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有的则因某种权威说法公布于前，尽管未必正确，却再也无法改变。对国内学者或外国政府的错误说法，也难以做出及时和有效的批驳。这种状况不改变，学术自然无法繁荣，但国家利益受到的损失更大。没有实事求是的研究，不首先查清史实，不了解中国与邻国关系和边界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何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睦邻关系？

以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为例。某一种影响颇大的《中国通史》认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应以今国界为限。这样一来，越南当

然不能包括在宋代以前的中国疆域之内，此前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也成了“国际关系”。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东汉初设置在今越南北方的交趾郡就成了外国，伏波将军马援出兵前往平定二征姐妹的反抗就成了对邻国的侵略，认为应该表示“歉意”。实际上，不仅交趾郡，就是更南的九真和日南二郡（至今越南中南部）当时也是汉朝的疆域，马援出兵充其量只是统治者镇压民间的“起义”或“叛乱”。直到10世纪越南脱离中原王朝自立，并成为中国历代的属国，两国间才建起一种宗藩关系——既不同于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异于现代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但由于过于突出“政治需要”，片面强调“古为今用”，在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时，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讨论两国学者间的分歧，尽管在某些方面一直很尖锐。而当两国交恶时，似乎以往两千多年间只有冲突和战争。

正因为如此，当孙宏年提出以中越关系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着实为他担心，深恐难以把握，或者完成后无法发表。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放心，因为他收集的史料相当全面细致，对已发表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也了如指掌，论证的过程都以事实为根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以往我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并未做过专门研究，但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时，多次聆听先师在审定《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的教诲，得知先师十分重视戴可来先生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方面的见解，并有幸见过戴先生。因此我让宏年去郑州大学向戴先生求教，并请戴先生评审宏年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好评，在答辩时也顺利通过。

毕业后，宏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之余，继续修订和完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这本专著。在本书问世之前，宏年要我写几句话，因此我做了上述说明。

近年来，中越两国领导人已经形成“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共识。历史学者的任务虽然是“记录过去”，但同样是为了开辟未来。因为只有了解过去的事实，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开创未来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因此，对中越关系过去的研究不会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失去意义。

2005年3月27日

序

戴可来

越南古为交趾之地，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有关义叔“宅南交”，神农、颛顼、尧、舜等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的记载，反映了早在传说时代，中国中原地区已与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和交往。而越南的信史不能早于秦代，约有两千余年，其中隶属中国郡县千余年，称“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越南在宋初（968年）摆脱了中国封建王朝长达千年的郡县统治，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但立国之后，仍与宋朝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了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形成了两国邦交的基本模式。直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这种关系和模式才告终止。

清代中越关系是这种模式的最后阶段，也是内涵最为丰富的阶段，这又是中越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由于这一时期双方政治变动频繁，涉及的问题复杂，给研究带来不少困难。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又主要集中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乾隆时期的安南之役、中法战争时期的中越关系等等，因此，从总体上看又略显粗疏，仍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孙宏年同志的这

部专著堪称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而成的。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此书的特点之一是史料丰富，充分利用了中越两国的官修史书、政书、档案、志书、奏议、文集等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一些已经翻译出版的法国档案。作者查阅资料时十分勤奋，力求详尽。1999年春，当他还在读博士时，就曾到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进行交流、学习，越南所和我本人为他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越南史料，其中包括《大南实录》《大南会典事例》《历朝宪章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这些都是研究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的越南文献，作者在这部专著中给予了充分重视，并结合中国史料，使一些问题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对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容、事项、规范、经贸关系、边界、海事和边事以及华侨、华人问题做了系统地阐述和考辨，构建了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研究的框架体系，又在前人在一些问题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主要反映在对清代中越宗藩往来的事项、规范和海难互助、边境事件、华侨华人数量以及来华越南侨民等方面。比如对于清代的中越侨民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比较关注于越南的华侨、华人问题，而对于进入中国的越南侨民，特别是政治避难者关注不够，且对进入越南的华侨、华人的数量问题也较少研究，本书中都力求详尽地论述。这些研究仅仅是一家之言，或许有其不成熟之处。但又把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此书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而是仍有需要进一步提高之处，比如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涉及方面较多，而且影响深远，又是清代中越关系的重要内容，本书对此却缺乏完整的理论阐发；又如作者未学习过越南语，只能参考已经翻译出来的越南文的论著，不能便利地直接阅读，在法文档案、论著方面也是如此。这也对一名年轻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已

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继续努力，特别是学习越南、法国等国的语言文字，把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中越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老一代学者对于年轻同志所寄予的厚望！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承作者雅属，为本书作序，欣然命笔，勉缀数语，以表达对他的祝贺和鼓励。

2005 年 3 月于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

前言

中越两国关系源远流长，秦汉至宋初，今天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长期为中国封建王朝统辖下的郡县，这一时期即为越南历史上的“北属时期”。968年，丁部领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大瞿越”，即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丁朝。^①此后，越南摆脱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中越关系成为两个自主国家的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也正是从丁朝起，越南封建统治者接受中国封建君主的册封，定期朝贡，两国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这种以册封、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宗藩关系^②，除了1406—1428年越南被明朝统治外，作为中越两国政治、外交往来的重要形式维持了近千年，直到1885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① 对于越南的立国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始于雄王时代建立的文郎国，距今已有4 000多年的历史，越南、法国、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此说；二是始于938年（后晋天福三年）吴权建国；三是始于968年（宋开宝三年）丁部领建国；四是始于1174年（宋淳熙元年）南宋王朝册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后三种观点在中国学者中各有支持者，参见楚汉：《五代宋初越南历史三题》，载《东南亚纵横》，1992（4），7~11页；孔嘉：《越南立国于何时》，载《东南亚纵横》，1993（3），51~54页。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② 有的学者把这种宗藩关系称为“传统的官方关系”或“传统的朝贡关系”，见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也有学者把历史上中国与琉球、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归结为“天朝礼治体系”，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本书以 1644 至 1885 年间的中越关系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从 1644 年起的 240 多年间，尽管中越两国都多次发生了王朝更替，两国又都受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直到 1885 年为止，中越两国关系始终是两个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的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外交上的宗藩往来，而且还涉及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边界领土交涉、海难互助和边境事件以及侨民等诸多方面。其中，宗藩关系是两国相互认可的封建王朝或政权之间的官方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边界交涉等方面一样，都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一部分，因为清代中国与并不存在宗藩关系的国家也有经贸、文化交流乃至侨民、边界交涉；宗藩关系又与其他方面相互影响，其演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越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中外学者已对 1644 至 1885 年间的中越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中国学者的专题性论著主要集中于宗藩关系、边界问题和华侨问题。对于宗藩关系，《清实录》《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等典籍中都有所记述，20 世纪中国学者出版的清史、中国近代史（近世史）、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史（南洋史）、东洋史方面的著作也往往简要论及，又大多提到 1788—1789 年清朝出兵安南和 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相关论文也大多集中在这两个点上。边界问题的研究大多与 1885 年后的中法勘定中越边界有关，华侨问题的研究又多与政治、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相关。

特别是 1949 年以来，中国学者整理、编辑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邵循正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及其续编《中法战争》（张振鹍主编，中华书局版）、《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中法越南交涉档》（郭廷以、王聿均主编，台北 1988 年版）、《近代中越